

新书推介

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海南现代化浪潮不断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趋同化倾向,黎族文化的多样性逐渐消失。特别是有些优秀的文化传承,已经到了濒临绝迹的境地。

我们并不认为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提升的过程,恰恰相反,现代化正在使我们丧失太多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现在越来越多的黎族同胞,已经意识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应当努力发掘与弘扬。三亚市政协主席苏庆兴先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新近出版的文集《拥抱大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以及民歌集《三亚黎族民歌》、论文集《黄道婆的三亚解读》和《三亚的光荣与使命》等,集中体现了苏庆兴先生精通黎族传统文化,又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自豪的治学精神和态度。

苏先生不仅勇于传唱传统黎族歌谣,而且创作改编了不少新的黎族歌谣。如《向往神鹿》、《黎锦颂》、《碧海黎家》、《海棠湾的太阳》、《槟榔河欢歌》等;这些反映黎族人民优秀传承和美好情操的歌词由著名作曲家孟庆云、杨天解、向东等的谱曲,部分曲目由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张也以及歌坛新秀雷佳、王丽达等人演唱,在省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正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家乡沃土的热恋,使苏先生总能提出对三亚建设极具启发性和创见性的建议。

苏先生虽然长期从事干部管理工作,但他对黎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很有远见。可以说既有否定成见,实事求是的勇气,又有严谨科学的研究与建设方法。无论是他的建言献策,还是学术探讨,都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前些年,对黎族传统民居的改造,出现了不顾民族传统建筑形式,整齐划一的取向,成片的水泥平房(或楼房)取代了几千年来黎族居住的船形屋。一眼望去如同兵营,根本看不出任何黎族文化的影子来。对此,苏先生清醒地指出:

黎族聚居区的民房改造,尚未正确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重建设轻保护,只求把茅草房变成平顶房,而忽视了黎族茅草房这一独特民居文化的保护,采取了比较简单划一的“一刀切”方法,致使许多富有黎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民居文化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了,民房改造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千篇一律的“平顶营房”,黎族的居住文化已完全汉化,再也没有自己的特色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

黎族传统民居是黎族民族特性的重要载体,人们一眼看到船型茅草屋马上就想到这是黎族人民世代居住的房子,这种效果与黎族的传统服饰黎锦一样,是不可替代的。离开了这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传统民居和服饰文化,黎族的特性将逐渐消亡,黎族的房屋将不再成为其“黎族”。

诚哉斯言!

下面引述的是第一个登上海南岛做田野考察的外国人类学家H·司徒博来到海南后的感慨: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海南人类文化学研究也引



苏庆兴(右二)到落笔村调研落笔洞遗址保护情况

《拥抱大海》·

守望者 黎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文\本刊特约撰稿 孙绍先

起我们的兴趣,两千年以来,汉文化从她的北方摇篮向南扩张,因而或多或少地吸收同化了一些不同种族、文化的人群。这种同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在海南这一同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今天就有可能跟踪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展示了南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所有可能方向。

今天中国文化察觉自身处于一个危机阶段,她正以令人惊异和让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吸收着欧洲的商品。许多旧的东西消失于黑暗中,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南方走在了保守的北方前面,因此对海南来说,巨大而迅速的促进文明进步的改变即将到来,因此现在是记录海南原始状况,以免它永远消失的最佳时机。

——《海南岛的黎族——南中国民族志补遗》H·司徒博

这段话是80年前讲的,在今天愈发显示出其令人心酸的预见性。因为在80年后,我们仍然未能完成“记录海南原始状况”的责任,有许多黎族的传统文化现象未经记录就在这70年间“永远消失了”。

对此,像苏庆兴先生这样对黎族传统文化负有深深的历史责任感的黎族同胞,他们的感受应当更为深切。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先生不仅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越是到今天,我们越能感觉到苏先生的远见。据说,苏先生的意见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新的黎族传统民居保护方案采纳了苏先生的意见精神。

苏先生重调查研究、重田野考察的精神让人十分钦佩。考虑到他公务繁忙,就更为难得。本书中收录的关于黎族婚姻礼仪和丧葬礼仪的文章,是我目前所见同类文章中最详尽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我正在撰写的黎族传统文化研究专著中,我将引证其中的经典材料。

苏先生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这是学者十分看重的探索精神。在研究黄道婆的文章中,苏先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尖锐而犀利:“黄道婆到上海前,她对棉纺织工具的改革和技术的提升已获成功,在上海仅是教授和传播,哺育她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乃崖州也。遗憾的是,她

功厚身微,非权贵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地位低下,加之封建社会对科学技术不予重视,造成史传稀缺。然而我想,黄道婆居崖37年,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探索、去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很多的。譬如,黄道婆如何学习、革新棉纺织技术?她向那个地方的那个族群学习?她对棉纺织工具及技艺的革新在那一阶段取得突破?黄道婆的成就对崖州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黄道婆时代崖州的经济社会尤其是棉花种植状况是怎么样的?黄道婆是人不是神,她居住何处?是否婚嫁?夫家何在?这些都有待我们深入的挖掘、考证,从方法上,从途径上,从物证上,找出有说服力的根据来。”

盼望有更多的像苏庆兴先生这样的黎族干部涌现出来,则黎族文化研究幸甚;黎族幸甚! 

读书札记

《进城走了18年》:

诠释70后的心灵史

文\陈岚桦

对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70后来说,伴随的青春记忆恐怕都与下列事件无法分开: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知青回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琼瑶小说、港台歌曲,这些1970——1990年代的记忆,恐怕任何一个经历者心中想必都难以释怀。

近期,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出版了其新作《进城走了十八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这既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体散文集,也是一部乡村少年成长史。砍柴君自称“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编年纪事。”在这本书中,十年砍柴一反时政评论和历史随笔的犀利和尖锐,而是以十分温情的笔触描述了1970——1980年代的湘中农村景象,通过乡村身份融入城市的点滴故事与心得,试图探寻城乡差别的制度性根源,引起了不少70后的强烈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砍柴君个人奋斗为“城里人”的经历,不仅是特定时期内一个人的孤本例证,也是一个大国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可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私人文本。

十年砍柴感触最深的是城乡差别的巨大和乡下孩子成长所处的资源劣势。他认为,对于多数的农村70后来说,进城的最大动力就是当农民太苦,要扔掉锄头把儿必须努力学习。而对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农村少年变为城市身份的路无疑更为艰难,多半是靠

高考或当兵才能改变乡村人的身份,而这两条路十分狭窄。尤其是在高考扩招前,农家孩子考上大学特别是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其意义相当于“鲤鱼跳龙门”的意义,意味着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甚至整个家族命运的改变。令人不由想起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篇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砍柴君在自序中描述了自己的身份焦虑,他讲到,常常做的两个梦或许能说明这种困惑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一个梦是他光着脚牵着陪伴其6年的一头水牛在田埂上吃草,脚被露水打湿;另一个梦是在高考考场里,数学试卷上一道题都答不上来,可我明明知道自己大学早就毕业进了城,可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

有人说常重复的梦境,说明一个人体内某种解不开的情结或密码。这两个梦可以说浓缩了砍柴君少年时最重要的事:艰苦的农活和艰难的高考,通过后者改变了命运。但即便能顺利进城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也不能自然地解决身份定位的困惑。

砍柴君的书里还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穷人家的孩子通过努力进入到社会上层的机会在减少,以往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在被迅速的稀释。在1980年代,当时大学依然是精英教育,农村、小城市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只要考上大学,意味着上升通道的打开。可以说:现在和1980——1990年代相比,今天“贫困的代际传递”更明显了。大学扩招后,农村孩子的努力被稀释了,农村孩子即使考上重点大学,到毕业时找工作时却要“拼爹”。

如果社会的公平问题不解决,主要以农家孩子为主的寒门子弟“没有春天”,寒门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长此以往,最终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十年砍柴还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中国社会乡土10年的变迁。他感觉到现在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在1920——1930年代,中国尽管也有外来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对乡村有冲击,但乡村总体的格局和程序没变,无论鲁迅回鲁镇,还是沈从文回湘西,感觉到的变化只是人心不古之类。而现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态已经被破坏,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活力和生气,呈现出了空壳化,哪怕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但实质上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砍柴君在书中沉重的写道:“那些日子,我们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进城走了十八年》封面



《拥抱大海》封面